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胡适与冯友兰的比较
福谷 彬 (FUKUTANI Akira)*

这次的报告首先简单地比较日本与中国的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方法，然后通过对胡适与冯友兰加以比较，对今后的研究方法进行展望。

1886年设立的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旧称）有“东洋哲学”科，然后东洋哲学科分解为“中国哲学”科与“印度哲学”科。零明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强调中国思想，特别是朱子学与西洋哲学的相似性很大，还没有严格的哲学概念规定。

零明期之后，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1953年）与武内义雄的《中国思想史》（1957年）作为真正的哲学史登场。这些日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与后述的胡适、冯友兰那样的中国的中国哲学史有明显的差异。狩野与武内的著作虽然以“哲学史”为书名可是书里既没有特定的西方哲学的概念或者理论，也没有特定的哲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影响。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都是“文献学者”，不是胡适，冯友兰那样的“哲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传统的。另一反面，他们的记述是并列的，没有描写哲学史里的特定视点。

反而是夭折的安田二郎的《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中出现了真正的哲学运用。安田把“哲学”作为分析的工具运用，这是他方法上的特点。他的登场在西洋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的交涉上颇具意义，代表了日本的“中国哲学”的成熟的，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接班人。

20世纪初“中国哲学”作为学术领域在中国登场了。民国八年（1919年）胡适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最早的中国哲学史之一。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接受了实用主义哲学。他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来再构成中国哲学史。胡适的这本书只有上卷，没有完结，可是胡适的哲学史观在这本书里显而易见。他以前的中国哲学史只是一个概说性质的课本，而他的哲学史则把实用主义哲学作为解释思想的工具。他运用实用主义哲学，把哲学史上的概念或者思辨看作各个的思想家面对的政治社会环境的适应或者反应的结果。

另一位齐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是冯友兰。冯友兰有几篇中国哲学论文，包括于民国30年（1941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采用“中性一元论”（neutral monism）描述哲学史。“中性一元论”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在一定时期采用的思想，认为观念与物质毕竟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的副产物。冯友兰用这个思想说明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提倡“新理学”，主张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如此来将胡适跟冯友兰进行比较的话，就能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差异。胡适更注视哲学的社会上的机能的侧面，而冯友兰关注其本体论。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有上卷，没有中卷与下卷。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论新实在论还是唯物论，把特定的哲学思想看作思想史的终点的哲学史越来越少。注视各个思想的社会机能的胡适的方法值得再评价。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